

青海文史資料選輯

第十七輯



22.2707934
144
117

青海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青海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封面题字 沈 岑
封面设计 周宜達
责任编辑 曾志鴻 王亞森
编 辑 姚秀川 刘英俊
韩新华 王晓舜

青海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青海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内字第024号

•

青海中山印刷厂印刷

印数：1—4,000 字数：124,000

工本费：1.40元

目 录

彭德怀副总理视察后子河乡	苏文渊整理 (1)
王昭同志在平安	铁进元 (6)
怀念戴亚英同志	李仲连 (14)
解放前后的华宝藏先生	才仁加整理 (24)
我们所知道的王德海先生 董尧基 吴 元 王亚林 索南杰	(38)
青海解放最晚的地区——玛积雪山	黄太兴 (51)
美蒋特务落网记	黄太兴 (56)
青海乳品加工业的起步与发展	
——从廖霭庭先生创建的利民食品厂谈起	刘春莲 (62)
海阳化学厂概况	陈显泽 (68)
解放前的青海洗毛厂	徐全文 (76)
建国前鲁沙尔镇工商业概况	张生佑 赵永年 (81)
青海解放前一些地区的集市贸易	程起骏 毛文炳 (92)
河湟巨商李耀庭	贺 勋 (96)
乐都上烟坊始末	林中厚 (110)

马麟在甘肃铸造藏元和加砸铜币…………… 刘大有 (112)

解放前创办“国立果洛学校”的经过

…………… 绳景信口述 冀迁运整理 (115)

解放前的乐都教育…………… 李承道 (125)

青海回族女子教育的兴办与发展…………… 马迪甫 (135)

解放前的青海广播事业…………… 胡敬一 (139)

回顾青海解放前的卫生医疗工作…………… 许学培 (142)

藏文新生体字模的创制纪略…………… 吴 均 (155)

民和县七里寺药水泉今昔…………… 杨永芳 (160)

既是寺院 又是学校

——记囊谦县大苏莽寺的一些特点

…………… 朱格丁杂 (162)

解放前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移驻玉树及青藏边境的

一些情况…………… 马生寿 (164)

第十四世达赖丹增嘉措坐床侧闻记…………… 铁进元 (172)

彭德怀副总理视察后子河乡

苏文渊 整理

在1958年7月，朱德副主席视察我们大通县后子河乡。随后仅隔两个月，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又一路风尘来青海视察工作，并且同样专程来到我们乡深入群众，体察民情，了解情况。他每到一处，都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他那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音容笑貌和亲切的教导，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记得那是10月的下旬。正值金秋季节，秋高气爽，淡云舒卷。那天，后子河乡的社员们，正在一面大场上紧张地打碾蚕豆。这些蚕豆正是两月前朱副主席看过的那块地里的。当时，这块地的蚕豆长得高大茂盛，朱副主席曾不顾雨后泥泞，兴致勃勃地站在地里扶着几株豆杆和自己比过高低。现在这片蚕豆成熟，社员们正准备单打单藏留作种子。这一天，彭总在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和青海省委书记高峰，还有公社第一书记辛守珍、社长姬应人和公社书记李应芳陪同下来到打碾场上。看到国家领导人不顾高龄，在百忙之中不辞辛苦，多次到这边远偏僻的山区小乡镇来视察，当时我们心情很受感动。彭总一走进场院，我们几个村干部迎上去热烈欢迎首长，彭总热情地同我们一一握手问好。他详细询问了生产情况后问：“这场蚕豆能打多少斤？”辛守珍回答：“可以打五千多斤，每亩能打一千斤。”由于太激动，辛守珍的钢笔掉在了地上，彭总亲手捡起来给他挂在了衣袋里。这时，彭总看到部分社员正在深翻土地，便走过去要了把铁锨也翻起了

地，动作十分熟练也很有劲，他边翻地边和大家亲切地交谈起来。当看到有3台“75型”拖拉机在深翻秋茬地时，彭总问：

“辛书记，你们有多少台拖拉机？”辛回答：“只有这3台，今天全出动了，我们还想买4台哩。”彭总听了，高兴地点了点头。

随后，彭总来到了后子河大队第二中队炼铁土炉群大门口，门口一块大红布上边写着五个大字“炼铁又炼人”，下面写着“后子河生产兵团”，彭总看了看，又一字一顿地念了一遍。支部书记兼民兵团政委肖守贵、民兵连长梁奎珍和卢大发等人迎上来，向彭总汇报了炼铁出铁的情况和数字，彭总听了摇了摇头，说：“这个数字可不小啊。蒋介石统治时期，全中国也只产四万吨铁”。

土炉群附近有一批从北京来的大学生正在紧张地炼铁，看到彭总向他们走去，就停下来高呼“欢迎首长！”“首长好！”彭总和他们一一握手问好，笑呵呵地对他们说：“炼铁也是炼人，经过了锻炼，看不出你们是大学生了。”炼铁炉旁有一些人还穿着新衣服在劳动，彭总见了，似乎悟到了什么，故意问辛守珍：

“辛书记，他们是什么人？”辛说：“他们都是农民。”彭总听了笑着说：“他们的衣服比大学生们穿的还好嘛。”

正在土炉群旁砸矿石的西宁市第四中学和女中的师生们看到彭总来了，都排队欢迎。当彭总知道他们是步行来参加炼铁劳动之后，问四中校长卢先引：“你们来炼铁厂多久了？”卢回答：

“已一个月了。”彭总又问他：“你是那里人，来青海几年了？”当得知卢是上海人，来青海已八年了，他风趣地说：“现在你不再是上海人了，你成了青海人啰！”

看完土炉群，我们把彭总迎进后子河大队第二中队的《农民之家》，在这里举行小型座谈会。那是两间不大的房子，里边摆着一些农产品和娱乐用品，彭总一一观看了各种农产品标

本，专心地听取了村干部们的汇报。他语重心长地说：“要进一步加强农民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要克服个人主义，打破本位主义，要树立‘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思想”。彭总停顿了一下，问道：“我说话你们懂不懂啊？”大家齐声回答：“懂哩。”彭总看见参加座谈会的人中，有一个老是站着不坐，问他是谁，省委书记高峰同志介绍说：“他是全国劳动模范，公社副社长，叫刘成荣。”彭总打量了半天，亲切地拉着刘成荣，让他坐到凳子上，风趣地说：“看来，你的思想还没有解放，你看我有多大岁数了？”刘回答：“总理有40多岁吧？”彭总爽朗地笑了起来说：“我已经60岁啰”大家看到年已花甲的彭总，容光焕发、神采奕奕，身体十分健康，感到很高兴。

座谈会之后，彭总在街上遇到一位农民，他亲切地拉着那老乡的手问：“你叫什么名字？”这位农民回答：“我叫韩玉清。”彭总又仔细端详着他，和蔼地问道：“你是回民吧？”韩回答：“是回民。”彭总又问：“回汉民族现在不会相互欺侮了吧？”韩愉快地回答说：“解放后互不欺侮了，互相团结了，现在我们吃饭、干活都在一块儿。”彭总听了满意地点了点头。走了不远，迎面看见民兵二连连长祁万寿（回民）昂首挺胸，端端正正地站着，肩上斜背着黄布红边的营值星带，臂戴红袖章，上写着“二连连长”四个字。看他这副装束和十分严肃的神态，彭总乐了，他故意问道：“你是干什么的？”这一问，祁更加紧张得不知怎么回答，竟连忙敬礼答复：“报告连长！”话音未落，惹得首长们都禁不住开怀笑了起来。彭总走过去拉着他和自己比身高，问他：“你今年多大岁数？看比我高得多嘛，你懂军事吗？”祁一本正经地回答：“我今年25岁。现在还不太懂军事，今后加强学习训练，一定能学会。”彭总笑着点头说：“好！好！”

在公社食堂里，尉德海（志愿军转业军人）正在准备饭菜，

彭总仔细地看了看已摆上桌的丰盛的饭菜问他：“你们每天吃的都这样好吗？”尉德海回答说：“不，我们三天才能吃一次这样的好饭菜。”彭总又问：“这个食堂有几个炊事员？有多少人吃饭？”尉德海告诉彭总：“这个食堂有6个人做饭，吃饭的有254个人。”彭总听了，再三叮嘱说：“你们一定要把饭做好，要让社员们吃好，吃饱。他们的劳动很繁重啊。”从食堂回来的路上，彭总一边走一边还反复地念叨着：“6个人做饭，254个人吃饭。”显然是在思考着什么大事。出了食堂，彭总来到托儿所，对管理人员说：“托儿所培养了孩子们的集体思想，减少了妇女的拖累；你们要管好孩子，要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啊。”随后，彭总还看了养鸡厂，向饲养员郑素娥和赵京平了解了饲养、管理和产蛋等情况。

最后，彭总来到社员吴振发家。吴家里里外外早已打扫得干净、整齐，彭总见了以赞赏的口吻说：“你的家蛮不错嘛。东西放的很顺眼，还有了热水瓶。”说着，彭总语气一转，又问吴振发：“你们在食堂吃饭好，还是家里吃好？”吴回答说：“吃食堂方便。”彭总接着又问他：“在家吃不比食堂更方便吗？”吴振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彭总又和吴振发扯了一会家常，就和大家告别了。

视察结束了，彭总要走了，我们后子河乡的干部群众在公路两旁目送敬爱的彭总，一直到彭总的汽车隐入滚滚的烟尘之中。

回首往事，感慨良多。当年我们后子河乡和全国各地一样，深受“高指标”、“放卫星”以及砸锅卖铁等恶风的苦害，干部群众怨声载道。但迫于当时的形势，即使面对敬爱的彭老总，我们也无法说真话，讲真情。比如，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我们一个晚上竟能积肥几十万吨。说穿了，就是把旧墙土甚至是把上午

垫圈的黄土，下午就倒腾到田里。结果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穷得揭不开锅的人越来越多，但我们只能强装笑脸敲锣打鼓汇报亩产双千斤的“丰收喜报”；再如，为了大放“钢铁卫星”，我们忍痛把火盆、铁锅、铁勺以至和“铁”字沾边的器具家什统统砸碎，作为铁“引子”投进小高炉。为其耗费的人、物、财力更是无法计数，大通矿务局挖的块煤都不够炼铁用，还从外省调煤；又比如，为了让中央首长看了“喜欢”，我们上下里外拾掇了好几天，动员各家各户把值点钱的东西统统摆到了招人显眼处；逢年过节才舍得穿的新衣裳也临时套在炼钢工人身上，以显示气派；再比如，当时农村风行的“机械化”，即用木料做成轨道、箱体、装上铁滚轴推行的土火车。这种东西不仅丝毫没节省人力，却常常因无法控制飞速滑行，撞人、砸人的事儿几乎天天都有发生，弄得人们避犹不及，惊魂不定。为此砍伐的树木更是无计其数。彭总看了这种土火车当即就明确指示：“这东西作试验可以，可不能当真，更不可推广。”可他何曾料到，这条大跃进的高烧中诞生的“怪物”，当时已象旋风般地在各地农村推广开了，群众的怨气全都窝在心里不敢说出来。回顾当时，我们从上到下干了多少这样可气、可笑又可悲的蠢事啊！每想起这些事，我们总感到深深的负疚和不安。所幸的是，彭老总当时风尘仆仆多次到全国各地进行观察了解和思考，已经比较清楚地觉察到了党的决策失误及其已经或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在和我们的交谈中，虽一路谈笑风生，爽朗风趣，可也不止一次地在举止言谈中婉转地表露了对决策失误及其恶果的痛心疾首，表露了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

时光流逝整整三十年了，今天回忆这段往事，我们除了对当时极左路线的深恶痛绝外，对彭老总的崇敬和怀念之情也更加深切，更加诚挚了。

注：根据王成功（时任后子河乡生产队队长）、朱守财（时任后子河乡生产队大队长）、孙文奎（时任后子河乡党支部书记）、李应芳（时任后子河乡公社书记）等同志的回忆，记录整理。

王昭同志在平安

铁进元

王昭，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人民的好儿子，在“十年文革”中饱受凌辱，不幸于一九七〇年二月十二日含冤去世。他生前系青海省委书记、青海省长。身居要职，躬身下同，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为扭转六十年代初期青海的经济困难及人民生活困苦的局面，做出了极大努力，洒下了心血和汗水。特别是一九六三年及其后在平安地区和群众坚持同吃、同住、同劳动，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保持着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给平安人民群众留下了极深刻的影响，受到平安人民的爱戴。被人民群众称为“王青天”。这里记述的是他在平安地区工作中的几件“小”事。

“贫下中农的糊糊饭里有政治‘维他命’”

一九六三年五月初至八月底，王昭同志带领一百五十一名厅级以下干部，组成省委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工作队，在平安公社进行社教试点工作。当时三年困难时期刚结束，这一带农村经济恢复迟缓，群众生活艰苦，人们只能靠野菜拌面糊糊过日子，对党的工作队态度很冷淡。为了开展工作，恢复生产，树立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他带头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做贫下中农的知心人。六月中旬的一天，他与省委许林枫等几名干部来到平安公社上庄大队，住进生活最困难的贫农王登军家。他和警卫员等共五名工作队员，带着自己的行李，住在王家潮湿的北房里。屋里没有打土炕，就找了几块木板支成了床。王家只有芽麦子面，就捏成了芽面疙瘩，王昭同志说：“这怕是农民

最好的饭食哩，不来农村，怎能吃到呢”。上庄大队有一户最困难的贫农，叫刘维金，就住在王登军对门。刘维金是土改时的雇农，住在一面土改时分的房子里，共三间西房，多年失修，墙歪屋黑。一门入室，南间烧饭，中央一面土炕，铺的是破沙毡，破衣服当被子用。北一间养着八、九只羊，真是一家同炕，人畜同室，平时连生产队的干部都不曾进他的家门，但王昭同志和许林枫，工作队员张伯平等四人就选定在他家开贫下中农会议，在他家吃饭，体验群众生活。王昭不嫌炕上脏、畜粪臭、炊烟呛，和工作队同志与刘家一家人共同吃甜菜叶糊糊饭，饭后召集贫农刘维良、刘维金、王登军等人开会，询问生产队的情况，询问他们的生活。教育他们要维护生产队集体经济。贫农刘维良等人多次来找王昭同志谈心事，汇报工作，王昭同志总是满面笑容，从刘维金家炕上跳下来，将他们让到炕上，态度非常和蔼可亲，大家都把他当知心人看待，什么话都愿意和他喧一喧。经过一个月的访贫问苦，组织了上庄大队贫农会，团结了广大劳动群众，顺利地开展了社教运动，刘维良等几位贫农成了社教中的积极分子。

王昭同志因为工作忙，不能常住在上庄大队，但一有空，他就来上庄大队了解情况，不仅吃、住在这儿，并且戴着草帽，穿着旧蓝中山服和一双布鞋，和大队、生产队干部去田间察看庄稼，一同和他们在洋芋地里锄草。为了指导全公社的社教工作，他经常深入其余十二个大队了解情况，走到那个大队，就在那个大队和贫下中农一块喝糊糊饭，有时就住在贫下中农家里，和房东促膝谈心，向他们讲革命道理，讲党的政策，启发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农民把他当做自家人一样。他曾经住过东村大队农民孙有库家的北房，在星多奎家喝过清拌汤，在杨家大队朱全正家、郝长全家住过、吃过，给这些人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他们说：解放以来，我们很少遇到过这样的好

省长。

王昭同志以自己深入群众，深入实践的感受作生动的素材。在平安社教干部大会上，平安公社三级干部会议上，多次发表演说，作动员报告，教育广大党员和干部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保持革命者的本色，收到了非常好的教育效果。他深有感触地说：“我劝所有的工作队员，所有的共产党员干部多喝一点贫下中农家的清汤糊糊，这里面有政治‘维他命’，有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治营养”。他的这句话，使全体工作队员受到教育，促进了坚持同贫下中农“四同”的优良作风的形成，很快地在所有工作队员和农村干部中流传开来，并且在全省各级干部中广为流传，成为当时一句名言，深为人们称颂。

“我们都是普通劳动者”

王昭同志在平安社教期间，不仅要回到西宁处理全省的重要事务，还要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领导平安社教工作中，忘记疲劳，饥饿，夜以继日地工作。为了更好地了解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他还抽空带领工作队员与农民群众一块到田地里参加劳动。

1963年6月中旬，农忙季节的一天，任该大队工作组长的原省工业厅副厅长李扬同志通知大队党支部书记马本华：王昭同志抽空要去和社员一块儿劳动，要你陪他同去。这天吃过早饭，马本华同志带上锄头来到公路边，只见王昭同志带着七、八名工作队的同志已站在那里。王昭肩扛着从社员家借来的锄子，头戴草帽，和大家一块到村北的洋芋地里去锄草。十几名社员加上工作队员，二十多人一齐儿摆开，精神抖擞地锄着草。多年来，未遇到过省上的干部这么亲热地和大家相处过。王昭同志身为一省之长，竟如此朴素地和农民在田间作劳。人们感到既惊奇又亲切。当时，农村草荒严重，有的地块野燕麦比麦苗多，危害

着庄稼正常生长。王昭同志知道这个情况后，要求工作队员同群众共同下田除草，鼓励社员战胜草荒，与草夺粮。有一天，他带领着工作队队部的其他同志，有工作队副队长许林枫、程光远，工作组长李扬和工作队员肖占奎（时任民和县委书记）等七、八名同志，由大队书记马本华同志陪同，去大豆地里与女社员共同拔燕麦草。王昭同志善于随时随地作思想政治工作，这次拔草中也不例外。马本华同志系一九五一年参军入朝作战的志愿军战士，王昭同志是志愿军的中将，参加过板门店谈判。二人紧挨着在一块拔草，相互喧着抗美援朝的经历，是那样的投机，那样的和悦。王昭同志拍着马本华的肩膀说：“老马，你我都是无产阶级的战士，是受苦人出身。当年，我是志愿军的一名军官，你是一名班长，地位、级别虽然不一样，可是在保家卫国的战争中，我们的功劳是一样的啊。今天，我是省长，你是大队书记，地位虽然不一样，可我们都是普通劳动者，是人民的勤务员啊。”鼓励他在家乡干好革命，带领乡亲发展生产，走社会主义道路。王昭同志这一天整整劳动了一个上午，和马本华边拔草，边喧了一个上午。谆谆的教导，革命的友谊，将二人的心亲密地连在一处。王昭同志的高尚情操，坚贞的品格，在马本华同志的心灵深处升华，闪烁。在他以后的二十多个岁月中，处处以模范共产党员要求自己，是东村大队建设社会主义的带头人。当他今天回忆王昭同志这段往事时，热泪盈眶，声音颤抖，心情是异常激动的。不久以后，王昭同志又和马本华及该大队社员李生智三人一同去生产队果园里浇水。三人一同将水堵进园子里，王昭同志在果树下，握着铁锹歇凉，与在水里洗脚的马本华、李生智二人闲喧。这是一副在困难年代充满着田园诗意的多么有趣的景象啊！当时，有一名画家即刻拍了一张照片，并且给马本华和李生智画了一张速写像留作了纪念。

王昭同志在百忙中和农民共同劳动，甘当普通劳动者的形象，二十多年来，清晰地留在人们的脑海里。

视 察 大 红 岭

王昭同志从一九六三年六月社教试点开始，就将平安地区看作搞好农村工作的一块“根据地”。当年八月底平安公社社教试点工作结束后，即组织青海省委第二次社教试点工作队，在平安地区的三个公社和邻县的两个公社进行社教，他亲任工作团长，发扬“四同”精神，经过四个月时间，于十二月底完成了试点任务。这两期社教试点，巩固了农村集体经济稳定了群众情绪，维护了农村经济秩序。加之允许社员开十边地，种少量自留地，养自留畜，放宽了政策界限，适当减轻了农民的公购粮任务，使农民得以休养生息，使这个地区的生产较快得到恢复和发展，亩产由一九六一年的109斤，一九六四年提高到270斤，接近一九五八年的水平。农民的温饱问题初步得到解决。一九六四年以后，他每次因事路过平安地区，总要到平安公社听取汇报，了解情况，进行指导。

一九六五年夏天，他去乐都一带进行调查，返回西宁途中来到平安公社，公社书记张致福同志陪同他到沈家大队视察。该队是个地少人多的地方，粮食比较紧张。当他得知沈家大队的东山有大片山洼地块可以开垦的消息后，便徒步登上名曰大红岭的高山，与公社干部、大队干部实地视察，共同研究开垦这一带山洼坡地，修电站提水灌溉。经过这次视察、研讨，由省水利厅拨款40万元（实际支出27万元），公社书记张致福同志亲临现场劳动，在县水利部门的协助下，大红岭建成三级电灌站，平整土地五百亩，取得了较好的收成。群众高兴地说：“大红岭过去连个麻雀儿都不做窝，现在变成了良田，多亏王昭省长他们规划的好”。

同 饮 窖 水 话 治 山

一九六六年五、六月份，“文化大革命”的火焰即将点燃。

“山雨欲来风满楼”，许多迹象已预示着党内将有一场大的政治风暴。一贯与人民群众休戚与共的王昭同志，不顾自己将受冲击，会同湟中县原县委第一书记余光同志、书记刘兴甲同志乘吉普车来到全省出名的干旱山头洪水泉公社。洪水泉十几个大队地处四十华里长的一道山梁上，海拔高达三千米，比湟水谷地高一千米。全公社大部分村落干旱缺水，人畜饮水靠窖里积的雨水供应，民谣曰：“洪水泉，洪水泉，三年两头旱，又缺柴又缺面，窖水苦水没法咽。”群众生活是非常困难的。王昭同志等人上山后来到这个公社最困难的北岭大队。在社员郭丁元家稍做休息后，即召开全大队干部会议，了解这个队的生产和群众生活状况，然后让在这里蹲点搞水土保持工作的省水利厅干部马正刚同志汇报修梯田种黑刺的情况，他一边喝着窖水，一边向大家讲治山的道理，并把这儿的山地与自己河北家乡的山地做比较，他说，修梯田，封山育林，是同干旱作斗争的有效办法，鼓励大家因地制宜，发动群众，持续干、不断干，肯定会有成效的。将来引水上山，情况还会大变。北岭队四十来户人家，二百多人口，当时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家不够吃，并且大部分吃的是青稞面、豆面。这天中午，郭丁元爱人烫了青油白面饼子招待客人，王昭同志很是过意不去，他硬让秘书给郭家付了五元饭钱，郭丁元执意不要，王昭同志硬是让放到锅头上。吃过午饭后，他让司机将小车从山坡根的村庄里开到山梁马路边，自己带领与会同志沿着山坡梯田视察，边走边看边商讨，一直绕过村北几个山头，爬上了山梁。他那种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一心关怀群众疾苦的高度负责精神，深深留在洪水泉农民群众的心里，更加激励群众年复一年的艰苦

奋斗。现在北岭村的群众喝着清澈的自来水，吃着白面花卷时，总是在惦记着王昭同志。

“王青天”的名字永留人间

王昭同志一九六一年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委托来到青海后，坚定地纠正“左倾”错误，制定放宽农牧业政策的九条措施，使青海的经济建设很快得到了恢复。特别是他在平安社教期间，体察民情，坚持与群众“四同”，深受人民群众的拥护与爱戴。平安社教后，在农民群众中即称呼他是“王青天”。“十年文革”中，这个名字经上庄大队刘维良公开喊出后，便迅速在河湟地区传播开来。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西宁流血事件后，王昭同志被无辜地扣以现行反革命等多种罪名，进行批斗。当时的平安地区“八一八”造反派战斗团，开创州县批斗王昭同志的首例，将王昭、张致福、刘维良召开万人大会进行批斗。会议由“八一八”组织的头头主持，会场设在平安中学操场（即现在的平安第一小学院内）。王昭从西宁被吉普车运来后，一支胳膊因被扭伤用绷带绑着，即刻被押上斗争高台。刘兴甲、张致福、刘维良同时被押上斗争台。台下还有各大队的所谓“走资派”陪场。这种捏造罪名，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批斗大会，激起群众不满，形成台上造反派歇斯底里地批判王昭同志，台下农民群众义愤填膺，小声纷纷怒骂造反派的局面。会场秩序紊乱，难以继续进行下去，会议只开了一小时左右就停止。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陪斗的农民刘维良大胆地喊出了“王省长不是走资派，王省长是王青天！”“王青天”的名字便公开地被喊了起来，在人民群众中传播开来，刘维良自此以后被“造反派”骂做王昭的“走狗”，王昭的“种子”，受到极大侮辱。他被公社、大队的“造反派”批斗三十多次，又是